

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西蒙娜·德·波伏瓦 研 究

李清安 金德全 选编



李清安
金德全 选编

西蒙娜·德·波伏瓦
研究

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编 选 者 序

李 清 安

人们有不止一种理由把 1986 年 4 月 14 日在巴黎去世的西蒙娜·德·波伏瓦看作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同样也有许多理由把她看作是本世纪一位伟大的女性。

作为一个存在主义的“介入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是与著名作家、哲学家让-保尔·萨特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是夫妻却又终生相伴的他们，被看成本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一对”。波伏瓦撰写的大量回忆录，是对萨特思想与成就的最权威诠释；而波伏瓦本人也在文学、哲学领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杰作。

还特别富有意味的是，在决定本世纪法国文学面貌的一代大文豪中，波伏瓦是继莫里亚克(1885—1970)、马尔罗(1901—1976)、萨特(1905—1980)和阿拉贡(1897—1982)等人之后，最末一位作古者，这就使她的去世也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正如法国总理希拉克所说：“西蒙娜·德·波伏瓦逝世的消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她的介入文学曾经代表了某些一度给我们的社会打上明显标记的思潮。作为一位作家，她那无可争议的才具使她在整个法兰西的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1981年，法国《读书》杂志进行一次民意测验，选出当今42名第一流知识分子。前四名均为哲学家和思想家，而第五名即为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就是说，在作家群中，她是独占鳌头的一位。即令那位古往今来唯一一位法兰西学士院女院士尤丝纳尔

和当时尚健在的大作家阿拉贡等人，也只能屈居其后，而1985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新小说”家克洛德·西蒙（也是萨特和波伏瓦在文学理论上的劲敌）则根本榜上无名。由此可见，“民意”对波伏瓦的敬佩之情，要大大超出屡遭其抨击的名人特权者流的评价。

当然，一个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所享有的声望，往往只具有参考意义，其真正的价值必须接受“时间的审判”（巴尔扎克语）。

—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年1月9日出生于巴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其父是一位思想保守、学识渊博的律师，其母则笃信基督。这位出身于“规矩家庭”的少女，尽管受到过严格的家教，却偏偏成长为一副叛逆的性格。波伏瓦自幼聪颖好学，孩提时代便尝试过小说创作，19岁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是巴黎大学出类拔萃的女高材生。1929年，21岁的波伏瓦以第二名的好成绩通过哲学教师全国通考。同年考取第一名的便是比波伏瓦年长三岁的让-保尔·萨特。萨特是举世闻名的巴黎高师的毕业生，同学中还有莱维-施特劳斯、雷蒙·阿隆、梅罗-邦迪和尼赞等人，堪称“一代精英”。他们是在迎接考试的复习功课期间结识波伏瓦的。大家对这位女大学生的印象是：“热情洋溢，行动干练，处事严谨，事事都挺在行。”而萨特眼中的波伏瓦则主要是这样几点：“富于同情心，漂亮，穿装打扮差了点儿。”

30年代，年轻的波伏瓦与萨特分别在马赛、勒阿弗尔等地任中学哲学教师，一边过着如漆似胶的热恋生活，一边苦心钻研勤于写作。两位终生喜欢游历的人物，在此间先后去了西班牙、摩洛哥、意大利、德国和希腊。这个时期的萨特和波伏瓦尽管十分同情左派激进势力，但基本上是不过问政治的。波伏瓦写过一部

小说，但被出版社退了回来。

激烈动荡的 40 年代，为萨特与波伏瓦学说的成熟与文学创作的成功，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萨特的出征和被俘，使波伏瓦一上来便蒙受到战争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他们的存在主义哲学也就是在此期间酝酿成的。波伏瓦的小说《女客》(1943)宣告了一位思想深刻、手法独特的女作家的问世。在抵抗运动的风风雨雨中，波伏瓦与萨特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诸如阿尔贝·加缪、雷蒙·格诺、让·波朗、米歇尔·莱利斯等人均为一代作家的中坚力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存在主义已经风靡法国，波伏瓦也就与萨特双双成了这个流派的杰出代表，并且创办了《现代》杂志。波伏瓦的小说《他人的血》(1945)、《人总是要死的》(1946)，剧本《白吃饭的嘴巴》(1945)和哲理著作《庞吕斯与西奈阿斯》(1944)及《论模棱两可的道德》(1946)都是集中阐发存在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命题。

1947年，波伏瓦单独出访美国，归来后发表了游记《得过且过的美国》。波伏瓦此行的另一个收获是结识了美国作家尼尔森·艾格林，行使了与萨特定交之初便讲定的“自由权”。转年发表的小册子《存在主义与各民族的智慧》，算是波伏瓦直接论述萨特学说的唯一一本著作。而 1949 年掀起轩然大波的《第二性》则使波伏瓦的名声达到了顶点(当然包括“美名”和“恶名”两个方面)，也充分显示了波伏瓦从存在主义立场出发开辟自家理论领域、论述重大社会课题的才能与气魄，并不比萨特逊色多少。此后在五十年代早期撰写的《论特权》(1955)、《当今右翼势力的思想》(1956)以及游记式专论《长征——中国随笔》(1955)等更说明波伏瓦广阔的视野和对题材的驾驭能力。波伏瓦所著最长一部小说《一代名流》(1954)将作者的艺术发挥到炉火纯青的水平，该书荣获龚古尔文学奖，进一步确立了她在文坛上的地位，也根本改善

了她与萨特的经济条件。

自 50 年代后期，波伏瓦埋头从事回忆录的写作，相继发表了《一个良家少女的回忆》(1958)、《时势》(1960)、《形势》(1963)、《总而言之》(1972)和《告别的仪式》(1981)五种。它们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文笔生动，详细描绘了以萨特为中心的文坛风貌，有着珍贵的文献价值，而且是深受欢迎的读物，故尔成为波伏瓦全部著作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整个五六十年代，波伏瓦与萨特积极参与法国和世界的各种政治事件，足迹遍及中国、苏联、日本、中东、巴西、东欧等国和古巴，到处作演讲、发文章、会晤国家首脑，并且亲身参加各类集会示威活动，热烈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正义斗争。在此期间，波伏瓦还忙里偷闲，撰写了小说《平静的死》(1964)和论文《论老年》(1970)等著作。

以 1968 年的“五月风暴”为标志，波伏瓦与萨特一起，晚年的政治态度仍很激进，始终保持积极“介入”的态度，投身于形形色色的政治、文学活动，用答记者问、在电台和电视台演讲、参与电影摄制等形式，发表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波伏瓦在早先的《第二性》基础上，进一步思索当代社会妇女状况和解放途径的问题，提出许多新的见解，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世界女权运动的领袖。她后期创作的篇幅不大的小说《华丽的意象》(1966)和《被遗弃的女人》(1967，包括三个短篇)也都围绕着女权主义的主题而展开故事。

1980年4月15日，萨特辞世。已届垂暮之年的波伏瓦，仍然笔耕不辍，完成了最后一本回忆录《告别的仪式》，对她与萨特最后十年的共同生活，做了完整的记载。她还继承萨特未竟的事业，担当起领导《现代》杂志的重任。

1986年4月14日，在萨特祭日的前一天，西蒙娜·德·波伏瓦因与萨特同样的病症——肺气肿，离开了人间。

二

“在我的一生中，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成功，那就是我和萨特的关系。”（《形势》）波伏瓦与萨特的关系，差不多是无法分割的。假如说波伏瓦个人成就中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她的小说创作和女权主义著述方面，那么，在政治倾向与哲学建树上，却是与萨特完全一致的。作为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的“教母”，波伏瓦在《第二性》，在她的众多小说，在她晚年大量的声明、演讲、答记者问和回忆录中，屡屡强烈地呼吁广大妇女要自强不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要“不让须眉”半步。可是，令许多女权主义“斗士”们迷惑乃至失望的是，波伏瓦又几乎是处处都在直言不讳地承认，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是有赖于萨特的。似乎是，在对一个作家来说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上，波伏瓦并没有给她的妇女同胞们作出榜样，却是乖乖地隐到了萨特的身后。这一点曾经引起过广泛的误解以至对波伏瓦的攻讦。

波伏瓦初识萨特时，并没有发生通常所谓“一见钟情”之类的事情，相反，波伏瓦甚至还用一种少女的狡黠，作弄过“喜欢与女孩子们来往”的萨特。但是，当二人经过了一番智力和学识上的较量之后，波伏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觉”：“所有没和他在一起的时间都等于是浪费掉了”。波伏瓦在充分体验过一个天资聪明且又肯下苦功的少女所自然会有有的傲气之后，“第一次感到在理智上受到某个人的支配”。（一个需要补充的情况：当萨特和波伏瓦以第一二名通过教师学衔考试之后，担任评委主席的著名哲学家安德列·拉朗德教授就曾对其他评委们谈到过这样的印象：“萨特无疑是才智超群的一位，但要谈哲学天赋，则当推波伏瓦。”）

波伏瓦认定：“一个巨大的机运落在了我的头上：面对未来，我突然间不再是单枪匹马的了。……萨特完全合乎我十五年来的心愿，他是我的化身。我看到我的所有癖好都在他的身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和他在一起，我永远可以分享一切。我知道他永远不会从我的生活中跑开了。”（《一个良家少女的回忆》）此后，21岁的波伏瓦与23岁的萨特在热恋之余，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私订终身”了。

波伏瓦很早就有一种明确的意识，敢于向陈旧的婚姻家庭制度和习俗挑战。她认为真正的爱情才是幸福，完全无须靠任何法律手段去做担保。当然，她也并不认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性爱问题。她固然觉得甘心作男人附庸的女人是可悲的，但也并不喜欢轻浮放荡的女人。而且，波伏瓦早就抱定一个坚定的志向，要当一名作家，一名思想家，认为把自己的生命派作这样的用场，要比生孩子，当一名贤妻良母更有意义。为此，她必须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必须使自己拥有大量自由支配的时间。碰巧萨特也一向“不喜欢一夫一妻制”，“不想在23岁就一辈子‘从一而终’”。“照他的意思，作家就应该漂泊四方，无牵无挂。”（《时势》）就这样，他们几经考虑，最终也没有结婚，而是订立了一项独特的口头“契约”，确立一种甚于友人，却又不是夫妻的“新型关系”。他们彼此相爱，又都给对方充分的自由。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道工作，经济上也不分彼此，但又总是不住在一处。他们俩人各自都曾有过外遇，而且基本上是互不“保密”的，这样自然也不免为此而痛苦，但是，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终于经受住了考验，做到了真正的至死不渝。他们“一起思考，一起战斗，一起获得文坛上的盛名”，的确是手挽手地并肩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事实证明，他们这种结合，倒是比一般世俗意义上的“结合”（即结婚）要牢固得多。当然，连波伏瓦和萨特本人也承认，这种生活方式在他们身

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可以作大家的楷模，因为，这需要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有一定的条件，而且，似乎也只能在这两个举世无双的独特人物身上才适用。用著名传记作家安德列·莫鲁瓦的话说：“他们之所以成为朋友，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便有着相近的哲学思想，有着共同的爱憎。”

波伏瓦坦率地承认：“萨特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创造性，而我却没有。在迫不得已之下，政治上做出一些抉择的情况总是有的，但萨特总能深化每种作法的理由，不象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形势》）波伏瓦确认：“哲学上、政治上的倡议都是来自他的。”至少在这一点上，波伏瓦直言不讳地把自己降到了次要地位上。而恰恰是这一点使波伏瓦的许多女读者大为恼火。她们以为是波伏瓦背叛了她们，也背叛了波伏瓦自己：她竟然接受了一个她劝别的妇女不要去扮演的“有限角色”。波伏瓦对此所做的答辩是：“我的独立性，我捍卫了。因为我从未把自己的责任推给萨特。任何一个想法、一个决定，没有经过自己的考虑和思量，我是不会有的。我的情感来自和世界的直接接触。个人的事业要求我探求、决定、坚持、斗争、工作。他帮助过我，我也帮助过他。我不是他的应声虫”（《形势》）。这一段话，有助于我们对于他们之间在事业上合作的方式及关系的理解。

三

作为一个存在主义的介入作家，波伏瓦与萨特一样，总是积极地介入生活，介入历史。从40年代开始走上文坛直至去世之前，她一直都在密切地注视着社会的种种变迁。所以，她的文学作品，便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生动记录，并且敏锐地触及到社会存在的重要问题。波伏瓦的小说中不无技巧，还时有成功的创新，并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但是，总起来说，相对于文学领域其

他一些不同倾向而言，波伏瓦的作品基本上是一种与人生密切相关的艺术，是一种带有思辨色彩的研讨问题的文学，这一点与其他种种所谓现代派的注重形式探索、追求纯文学价值的倾向，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别，甚至可以说，波伏瓦对于现实的关注程度和揭示现实的深刻程度，比起一些自诩现实主义的法国现代作家们，显得更加有力，更加富于历史责任感。

1943年发表的小说《女客》是波伏瓦的处女作。这部历时四载的小说，差不多是与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同时酝酿而成的。跟萨特的《恶心》、加缪的《局外人》一样，《女客》是一本直接阐释存在主义思想的哲理小说。小说的主旨，并不是表面看来的一桩情杀案，也不是所谓“三位一体”生活方式试验的失败。而是象萨特的剧本《间隔》一样，将弗朗索瓦丝、比埃尔、杰贝尔以及伊利莎白和克洛德等少数几个人物，放到一种特定的“情境”中，迫使他们为个人的自由进行选择。小说借此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可沟通性，说明现实生活之无从把握，弗朗索瓦丝所代表的理性在克萨维尔这样一位非理性面前的束手无策。小说的场面十分狭小，人物也十分简单，而且大量采用对话的形式，辅以内心独白，揭示人物的意识活动。

《他人的血》是在《女客》之后很快写成的。当《女客》发表之际，《他人的血》已经完成，但因表现的是抵抗运动的内容，不能不等到巴黎解放之后才得以出版。《他人的血》尽管仍然也阐发存在主义的哲学见解，但毕竟展现了法国人民抵抗法西斯的可歌可泣的业绩，并且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充分肯定了那种真正的、意即有益于人类正义事业的选择，《他人的血》与加缪的《鼠疫》和萨特的《自由之路》，共同标志着存在主义哲学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考验，完成了一次世界观上的飞跃。

作为一部小说，波伏瓦曾经满意地表示：“我的第二部小说比

第一部小说更富艺术性，它在表现人类关系方面具有更真实、更广阔的视野。”而且，她还欣喜但又理智地认识到，小说之所以令人感到“热血沸腾，生机勃勃”，一半是创作，一半也在于读者当时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读者和作者都做出了同样的贡献。”

在《他人的血》之后，波伏瓦相继发表了《庇吕斯与西奈阿斯》和她唯一一部剧本《白吃饭的嘴巴》。而她最重要，也是最富积极意义的小说，则是1954年发表，并获得龚古尔奖的长篇巨著《一代名流》。在波伏瓦的全部文学作品中，《一代名流》要算是现实主义成分最多，并且表现了广阔社会生活场景的一部。

小说的主人公左翼著名作家亨利·佩隆与罗伯尔·迪布勒伊和安娜，迪布勒伊，虽然一如波伏瓦此前的所有小说一样的那种知识分子，但已经明显脱去了那种似乎公式化的犹豫甚至沉沦的存在主义心态。故事的背景也不再具有那种虚幻地设定的气氛，而是与历史真实有着更为细致的联系。

小说充分展示了本世纪中叶知识分子在“冷战”形势下进退维谷，左右受敌，在尔虞我诈的政治角逐中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的窘境。波伏瓦始终拒绝人们称《一代名流》是一部影射真人真事的小说，但作为该书中心事件的亨利与罗伯尔的决裂，实在太象萨特与加缪因《反抗的人》而爆发的那场论战和继而导致的绝交。这样，《一代名流》便为这场带有典型意味的历史冲突，留下了生动的记录。小说再一次让主人公在棘手的情境中被迫进行选择，并且几乎陷入灭顶之灾，但通篇的格调是明快的，结论也是积极的，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波伏瓦已经大大地超越了萨特存在主义的局限，表现了作家要丰富的生活，要积极地介入，要影响现实的可贵意愿。如同作品末尾罗伯尔·迪布勒伊所说：“现实并没有停止发展，它有未来，有能力。不过，为了影响它，甚至仅仅为了全面认识它，必需深入到现实中去，而不是醉心于自己渺

小的理想。”

从1958年起，波伏瓦埋头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回忆录，小说创作一度中断。《华丽的意象》(1966)和短篇小说集《被遗弃的女人》(1967)成了波伏瓦平生创作的最后两部文学作品。

晚年的波伏瓦曾用这样的一段话来概括自己的文学观：“对于我所写的作品，我都是非常下功夫的，但我并不想使自己成为一位写作高手，比如说，象维吉尼亚·沃尔夫那样。我所感兴趣的不是这个。我也没有象巴尔扎克或左拉那样，尽力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去如实地反映世界，尽管这种方法可能十分丰富。我确实只是力求从自己的经历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东西，把凡是能够表述的一切都表述出来，以使其有益于他人。”波伏瓦就此廓清了自己与通常所谓现代派和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不同的创作道路。

存在主义作家与以往的现实主义文学根本的不同点在于，他们从其特定的哲学原理出发解释世界，而不是“如实地反映世界”。无论萨特，还是加缪和波伏瓦，他们都把自己的哲学放在文学之上，文学形式只是表述其哲学观念的工具。如萨特在与波伏瓦的对话中所述：“是的，一个作家理当成为一个哲学家。……文学的成绩就在于用写成的书为读者揭示出他不曾想过的事物。……倘若一个作家揭示了世界的真相，他便是一个好作家。”这样，他们观察剖析描述世界，无不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意味。他们的作品，大多具有形象与内涵不尽一致的地方。所以，被公众“误解”和造成“脱节”的情形时有发生。比如，波伏瓦的《他人的血》意在表述人在自由选择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所写的抵抗运动斗争只是该书中无关宏旨的外壳。然而，人们还是不由分说地把它视为一部抵抗运动小说。

存在主义者出于他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他们所塑造的文学形象，不可能与旧有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那些强有力的形象相媲

美。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为身处困境的人类提出积极的答案，而只能满足于提出问题。如波伏瓦所说：“人们经常问我：‘您所塑造的妇女，为什么没有一个是正面角色？’原因在于，我害怕这样做，我害怕正面角色，我对描写正面角色的书不感兴趣。一本小说，就是一堆问题。我的一生经历本身，也不过是问题成堆。我没有必要向人们提供答案，人们也无需期待我能提供什么答案。”这样，就其对生活的介入程度，就其作为作家所负有的责任感而言，存在主义作家甚至比某些同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更积极、更勇敢，他们所揭示的问题也更尖锐、更深刻。如波伏瓦所说：“文学是富于人性的，为了不让它堕落为消遣品，人必须使它和自己的存在混为一体，而不要心分几处。”但是，用旧有的现实主义标准去要求他们的作品，却不免会失望或者抓不住其作品的真意和主旨。

于是，存在主义作家的介入态度，便在两方面都遭到攻击：抱定现实主义原则的进步人士责备他们太消极，没能指出斗争的出路；而注重纯文学探讨，主张超脱的文学革新家们，又嫌他们太激进，太委曲了文学。加缪被视为“反共作家”，女权运动的战士们抱怨波伏瓦的小说缺少积极的内容，没有榜样。这些便是前一种倾向的例子。而克洛德·西蒙指责萨特的介入观是“换上巴黎标签的日丹诺夫货色”，罗兰·巴特把波伏瓦鄙夷地叫作“写家”而不配称为作家，则是后一方面的例证。坦白地讲，这两方面的指责，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都有点冤枉。

波伏瓦认为：“创作是闯荡，代表着青春与自由。每一页、每一句都要有创新，有新意。”纵观波伏瓦的小说创作，虽然不象“新小说”那样标新立异，但仍可明显看出她在艺术手法上不断探索的倾向。波伏瓦的小说，无论采用怎样的题材，其中心意图都无一例外地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的意识活动，所

以，总是较多地运用对话与内心独白相结合的方式展开。波伏瓦笔下的意识流，可谓既娴熟而又不露形迹。特别在揭示现代西方知识女性种种内心感受方面，堪称无出其右。书中大量的对话，内容广泛，生动活脱，富于个性，并且节奏抑扬顿挫，可谓炉火纯青。波伏瓦极少甚至根本不会描述人物的外表，单靠对话辅以少量内心独白，便足以给读者造成鲜明的个性形象。以《一代名流》和《华丽的意象》为代表的“双轨制”叙述方式，极大地扩充了作品的思想容量，非常有力地表达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仿佛有一个镜头观照事件的外部进行，同时用一只X光机透视人物的内心世界，二者轮流运转，交叉映现，使得主人公的行动与意识毕现无遗。并且二者变换自然，读起来并不使人觉得生硬。当然《他人的血》似乎将这种手法运用得过分了些，使得作品在结构上支离松散，读起来也觉吃力。

莫鲁瓦在评论波伏瓦时曾经这样说道：“西蒙娜·德·波伏瓦不是维吉尼亚·沃尔夫：她们两个人，一个逃离了自己的阶层，一个热爱自己的阶层。但两种见证发出的声音都是准确的声音。”艺术毕竟不同于科学，理应允许各以自己的眼光看取生活，各以自己的声音发抒感受。

四

波伏瓦固然没有象萨特那样，以《存在与虚无》那样的哲学巨著，独创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顺便说明，萨特在撰写这部书的过程中，与波伏瓦进行过长时期的讨论。应当认为，这里边也包含了波伏瓦的部分思想和成果。）但是，波伏瓦却运用萨特铸成的存在主义武器，在不止一个理论领域独辟蹊径，显示了她在理论建树上的不凡功力。诸如《论模棱两可的道德》、《应否焚毁萨特？》、《论老年》等，都不失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力作。当然，波伏瓦最重

要的理论建树，无疑是那部长达一千多页的巨著《第二性》。

在古往今来的妇女问题文献中，《第二性》堪为一部集大成的理论著作。波伏瓦认为，以往关于妇女命运的种种争吵，根本不利于弄清事情的真相，她主张摒弃“优越、低下、平等之类无助于理论探讨的含混不清的概念”，而要“从头开始，另辟蹊径”。作者从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主体”与“他人”的关系出发，指出“两性关系并不是正负电、南北极的关系：男人同时代表阳性和中性，以至在法语中男人(Les hommes)同时又泛指人类，‘男性’的特殊含义被‘人’的一般含义所吸收了。女人则表现为阴性和否定，乃至所有的规定对于她来说都是单方面的限制。”这就是说，男女两性关系的现状是：女人已经成了相对于本质的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只是“他人”。波伏瓦比较了妇女地位与黑人、犹太人、无产者之类受压迫者的处境的异同，指出妇女的命运甚至不及上述种种显著的受害者，因为，黑人造反了，犹太人解放了，无产者也闹起了革命，而“妇女的行动却始终还只是象征性的骚动。她们只赢得了男人们愿意施予的东西。她们什么也没有获取，只是被动地接受”。这样，妇女即便不说是男人的奴隶，至少也仍是他的臣仆。人类中数量相等的两性从来也没有共享过这个世界。波伏瓦以其理论上的洞察力，非常鲜明地指出：“假如说女人好像是永世回不到本质的非本质，其原因是在于她们还没有试图恢复自己的本质。”这就是人们随处可见的妇女状况的“事实”。而迄今为止由男人们垄断的人类文化，却偏偏造成了许多关于“永恒女性”的“神话”。生物学、精神分析学乃至全部文学，都在无尽无休地重复说明女人是天生的弱者，是有缺陷的生物，在男人面前注定要自惭形秽，是“乳房加大腿”，是神女兼荡妇，是专司繁衍的子宫，只有等到取消了重体力劳动之后才能得到解放。波伏瓦惊呼：这太不公平！妇女必须从“永恒的女性”中

解放出来。人是要通过行动，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妇女也只有通过行动，才能重新塑造自己。

波伏瓦在《第二性》提出并且论证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的著名命题。她引用马克思的格言，说明既然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最必须的关系”，因此，人，男人和女人，应当都承认对方是主体，而自己相对于对方又是他人，从而在现存世界中树立起自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二性》几乎是一劳永逸地论述了妇女命运的问题，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波伏瓦的理论实力。尽管它在出版的当时一度引起轩然大波，毁誉不一，使波伏瓦受尽了詈骂，同时却也使她名声大噪。而它的真正价值在二十年后西方女权运动波澜壮阔地兴起时，才真正被人们所认识。

1968年“5月风暴”以后，随着一股广泛的怀疑和否定资产阶级价值的思潮的兴起，新女权运动蓬蓬勃勃地席卷了美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与萨特一起积极参与过“造反有理”运动的波伏瓦一反以往与女权主义不相来往的态度，站到了运动的最前列。她签署了著名的“343名堕胎者宣言”，她加入了妇女解放组织，并担任领导职务，她以七旬年迈之躯走到了女权主义示威游行的队伍之中。与此同时，波伏瓦对妇女问题的看法也进一步深化。波伏瓦意识到，《第二性》仅仅侧重于在理论上分析妇女命运，却没有指出争取妇女解放的策略和途径。几十年历史的发展以及世界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状况的变迁，使她感到左派势力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并不象她早先设想的，可以顺带实现妇女的解放，而是要在阶级斗争之外，另搞一场“两性战争”。换言之，妇女的解放，要靠妇女自己。

由于波伏瓦在理论上的巨大贡献，也由于女权主义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近二十年来，西方妇女解放事业的确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妇女的社会地位提高了。随着各种法案的通过和实施，妇女的社会福利和所享有的自由增加了许多。应当看到，这是一项不小的进步。考虑到这一回合的女权运动是“五月风暴”学生运动的继续和延伸，所以，不妨说，它是在一个原先意想不到的领域内造成了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冲击。正如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引用马克思的话所预言的：男人与女人之间关系恢复到怎样自然的程度，人性也就复苏到怎样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妇女的解放是人类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阶段的标志之一。也正因此，波伏瓦的著作和晚年社会活动，有着难以逆料的历史意义。但是也应指出，迄今为止的西方女权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混声大合唱”，其中有波伏瓦所代表的人类理性的呼声，也有混杂着西方社会怪异内容的噪音。诸如“性解放”、同性恋、“阉割男人”之类的荒唐主张，也都成了这一运动的派生物。这一点，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作出合乎实际的分析，绝不能一概而论。这里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西方女权运动的意义和未来，我们姑且不论，仅从它已经产生的影响和波伏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来看，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在积极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行动中，结束了她丰富而且有益的一生。她的确确为妇女，因而也为全人类，作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

五

无论从肯定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个人作用，还是从了解让-保尔·萨特的目的出发，波伏瓦的一生著作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此，我们编选了这本研究资料。

波伏瓦的小说创作和《第二性》，无疑是她全部著述中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但是考虑到有不少作品已经或者行将全文译出问世，所以我们适当压缩了这方面的内容，只择要选收了一些最具